书评#动态

多学科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
))) 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俊峰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开始倍受瞩目。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二、三年时间里，区域社会史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除历史学者以外更多学科学者的关注，相关著述和论文也层出不穷，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繁荣局面。一批以/新史学0 /新社会史0 冠名的学术新成果，更昭示和代表了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国内外学者在各自的学术实践中已达成了如下共识：中国社会史研究要取得新突破，必须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重视地域差异，进行分区域的个案研究，努力从本土化的研究中构建不同区域的理论体系与解释模式，进而做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为全面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国内开展社会史研究较早的机构之一。近年来，我们在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也不断取得新进展：1998年乔志强、行龙主编的5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6，2002年行龙主编的5近代山西社会研究))) 走向田野与社会6 便是我们近些年成果的结晶。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我们也深刻地体悟到，只有以特定区域为中心，从整体史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多层次的纵横向透视，才能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根本脉络，形成有利于理解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特点的解释模式，进一步解决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本土化0 的问题。

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渗透是社会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深化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我们联合了山西大学校内不同专业学者，组成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术团体，明确了总体研究目标和具体研究任务。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山西是社会史研究的/宝库0，散存于民间的各类史料和/地方性知识0 非常丰富，要充分地挖掘，必须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认识，调动山西各地方学者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充分整合省内学术资源，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山西籍学者的团队优势，在全省上下形成一支具有明确学术目标的学术群体，共同用力，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提升到较高的层次。

在上述思路指导下，2003年11月1) 2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历史系、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发起的/山西区域社会史0 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学召开。会议参会代表共51人，收到论文53篇。本次会议可谓山西社会科学界的一次空前盛会，所有代表均系山西省内人士，分别来自山西省内各大专院校、专业研究机构和地方史志、文博、戏曲研究单位。参会代表除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历史地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戏曲、民俗学、生态学、气象

[收稿日期] 2003- 10- 18
[作者简介] 张俊峰（1976) ），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山西太原 030006

学、考古学和金石碑刻研究的学者，多学科色彩非常浓厚。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作了大会报告：5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兼论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之研究6。行龙指出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理论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提出在方法论上，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及其划分区域的客观标准；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变迁的实际和特点，结合国内外学术发展前沿和主要趋向，提出今后山西区域社会史应当首先从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状况及其变迁等四个方面开展研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属二级学科，三者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然而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这一点，即从事人口研究的学者并不关注人口再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与影响；同样，从事资源、生态环境研究的学者也多侧重于自然、生态本身，忽略人口方面的问题。近年来，一系列严重的现实问题，如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匮乏、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等，使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为理解现实问题的形成与解决提供借鉴。反映在学术界，生态史、环境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已成为当前甚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学者关注的热点。

人口问题是社会史研究的起点，山西自元末明初以来，由于未受战乱的影响，人口相当密集，明初和永乐年间的数次大规模移民已显示了人口压力过大的信号，明清以来山西地区人稠地狭的局面始终未得到改观。直至清末光绪初年出现 /二百年未遇0 的丁戊奇荒，山西人口亡失数量达 500 万之众，始缓解了长期存在的人口压力，然而灾荒却成为山西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关节点，灾前与灾后的山西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迥然相异。探讨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正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人口数量和人口分布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和风俗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人口数量正确估算是开展相关问题研究的必要条件。张万寿 5里甲制度在人口分布变迁研究中的应用初探) 以曲沃为例6 提出了借助乡里制度复原历史时期人口数字、人口分布和移动状况的新方法，有益于深化人口分布规律的研究。马玉山 5清代太原城区人口推测6 将影响人口发展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认为外部因素决定着城区人口发展呈曲线形态，而城池是人口的载体，其内部布局和设施的面积测算，是分析人口分布的主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清代承平时期太原城区人口约为二十一、二万左右。二位学者的研究分别为测算乡村和城市人口提供了新的手段和依据，对人口史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人口高性比例是明清以来山西人口结构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杨国勇在 5关于山西人口的高性别比问题6 一文中运用大量人口统计数字，通过精确计算和比较，指出山西在周朝和明清以来就一直存在人口高性别比问题，分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普遍原因和山西地方的特殊原因，进而分析了该问题造成的种种社会危害，如买卖婚姻、早婚严重、男子 /光棍0 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等。在进行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时，充分考虑人口数量、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非常有助于深化对某些社会问题和历史现象的理解。

水资源匮乏也是长期困扰山西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十年九旱0 一直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至今少数山区仍有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水资源的日趋紧张，不仅与人口数量增长，土地面积增加直接有关，而且与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的频发，以及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明显的因果关联。本次会议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影响山西区域社会成长发育的 /水资源匮乏0 问题，出现了一组颇具个性的 /水0 的文章。张俊峰 5明清时期介休洪山泉域社会变迁研究6 就试图以水案为线索，紧紧抓住区域社会民众强烈的水权意识，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立体地透视介休洪山泉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

从有关水的传说、水案的记载进而探讨区域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乃至区域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对水神祭祀活动、民间水利组织、地方社会力量和官府在水资源纠纷中的各自表现，指出洪山泉域社会以水为中心的社会运行特征和自宋代以后从资源共享型向资源竞争型社会转变的特点。与之相对应，段友文和冯俊杰对山西乡村水利习俗的研究使他们有了更多对话的空间。段友文 5山西临汾平水神祠碑刻及其水利习俗考述6 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对平水神主由来、庙宇修葺、祭祀仪式、争水械斗、水规水法、管理组织等相关的水利习俗作了深入考察。冯俊杰 5旱灾与雩祭6 则系统考察了自古以来朝廷、官府和民间的雩祭史料，尤其是山西这个 / 十年九旱0 之区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多种形式的雩祭形式和相关水利习俗，分析了雩祭的政治、宗教、社会功能，指出宋代以来民间祈雨取水及相关习俗，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宗教信仰注重感性、重现世和重实用的一面。各地形式多样、奇特的祈雨民俗，成了中国地方社会重要文化标志之一。段、冯二人的研究与张俊峰关于洪山泉域社会的研究相较，明显反映出社会史与民俗学研究者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双方都具备了借鉴吸纳乃至对话的余地。此外，胡英泽 5从水井碑刻看近代山西乡村社会) 以晋南地区为个案6 就晋南乡村社会的吃水困难问题作了研究，该文利用明清以来晋南地区的水井碑刻，考察了井的开凿、管理、汲水等习俗，试图探讨水井组织与乡村权力组织、乡村重大社会活动之间的密切关联，寻求社会组织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运城地区金石专家吴钧先生的 5河东水利碑刻刍议6 则依据作者多年来对运城地区碑刻的搜集整理工作，指出该地区水利碑刻中蕴含的丰富社会内容和研究价值，丰富的水利碑刻资料使与会学者对进一步开展山西 / 水与社会0 问题的研究充满信心。上述五篇关于山西区域社会水问题的文章，表明以 / 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其相关问题0 为中心开展山西区域社会运行与发展变迁模式问题的探讨不失为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其中可挖掘的内容相当丰富，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着力。

分期问题对于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至为重要，任何一个区域内都有对本区域社会发展变迁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比如光绪三年的 / 丁戊奇荒0，就是山西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灾荒前的山西人口总数已达到 1640 余万，而灾后人口锐减，不足 1000 万。灾荒对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超出了任何其他政治事件的影响，灾前与灾后的山西社会迥然不同，对该问题的探讨自然必不可少。郝平 5山西 / 丁戊奇荒0 的受灾强度6 以山西各地大量灾荒碑为主，重点从粮价、人吃人、瘟疫、狼鼠灾害及人口亡失等方面揭示了大灾荒对山西省区危害的严重程度，丰富的灾荒碑和地方志资料是其研究的突出特点。郭春梅 5河东 / 丁丑奇荒0 探研) 以碑刻资料为主6 以光绪三年被灾最重的河东地区作为考察范围，通过分析五通灾荒碑文，考察了灾荒中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粮商、士绅及普通民众的各自表现，指出了灾荒对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灾荒问题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普遍认为灾荒史的研究仍需在考察灾荒表象、救灾机制等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探究灾荒的社会影响、灾荒期间的民众心理、行为方式变化等方面的问题，应突破就灾言灾的局限，立体地全方位地对其加以透视，使灾荒史研究成为分析山西区域社会变迁状况的一个视角。

造成明清以来山西社会水资源匮乏、灾荒尤其是旱灾频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恶化，一组以生态变迁为主题的文章对该问题作了相当有力的阐释。曹才瑞 5近 500 年来晋中地区自然灾害的变化趋势与旱涝阶段性周期交替演变规律6 从气候学、经济学及灾害学角度出发，搜集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史料，运用统计学、方差分析数学处理方法，对山西中部地区历史自然灾害进行了研究，得出晋中地区的自然灾害与旱涝演变规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有力地支撑了明清以来山西社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观点。明清以来山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最突出表现是水土流失，梁四宝 5清代晋陕两省的经济活动与水土流失问题6 通过考察清代晋陕两省的土地垦殖、工商业发展和其他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指出水土流失问题是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最突出恶果。该文作者由于具备历史学、地理学、经

济学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因而对水土流失这一问题能够作出细致深入的专业阐释，令人信服，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和好评。山西森林史专家翟旺先生5雁北森林与生态历史变迁6进一步对生态变迁问题做了研究。文章指出明以来人类活动对森林灌草的严重摧毁导致生态恶化的局面。文章充分发掘并利用了地方志、明清会典和通志中的大量文献资料，并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森林、生态保护与开发的亲身实践，提出了富有启迪意义的新见解。

正是由于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日益恶化，使明清以来山西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探讨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为切入点，从总体史的角度开展山西区域社会研究，不仅可以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而且提供了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新方法。从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

明清晋商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在山西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日益紧张条件下逐步形成的。晋商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和市场网络，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研究者公认，对晋商发源地的山西地方社会来说，其影响则更为深远。以往的晋商研究多侧重于晋商兴亡、经营之道、票号、商业家族等方面，且多从经济史、经济学、金融学的角度切入，就商言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晋商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与国内的徽商研究相比也略为逊色。本次会议一批学者以探讨晋商与地方社会关系为着眼点，力图在晋商研究方面实现新突破。殷俊玲5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6从清代晋中社会生活状况入手，考察了晋商发达对地方社会日常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深刻影响，展现了清代晋中商业繁盛之地社会生活的特点以及商人生活的/奢靡0对地方民众价值观念的影响，文章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再现了清代晋中社会浓重的商业气息，可读性强，对晋商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充实。黄鉴晖5晋商与晋风6对晋人崇商之风做了历史考察，研究更具理性思考，提出山西民众崇商观念的确立，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新的价值观念战胜旧的价值观念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对民众日常生活、价值观念、民俗文化的探讨与前述殷俊玲之研究有相通之处。两篇分别以戏曲和秧歌为题材的文章，使晋商研究显得更加清新并充满活力。郭士星5论晋商对山西戏曲文化的贡献6认为明清两代，山西戏曲的繁荣和传播，是与晋商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韩晓莉5从祁太秧歌看晋中社会女性观6则以晋中地区流行的地方小戏祁太秧歌为素材，探讨晋中商业社会氛围下的女性婚恋观、家庭伦理观、个人价值观，从民间小戏中反映的地方文化与儒家传统精英文化的背离来观察晋中社会女性与其他地域的共性与差异。此外，在传统的晋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若民5从平祁太留存碑刻看其经济社会变迁6以平遥南神庙、太谷净信寺留存的商号布施碑刻为线索，结合明清之际边境贸易的发展背景，证明北方早在明末，在货币流通领域商人汇兑银两已比较普遍。伴随着蒙汉交往的日益频繁，清中叶平祁太工商铺户获得更大发展，并直接奠定了平祁太金融业在全国的垄断地位。该文将平祁太商业繁荣置于明清朝廷与蒙古民族相互关系的场景之下，视野开阔，论证有力，得到与会学者的充分肯定。同样，孔祥毅5镖局、标期、标利与山西社会信用6也在作者多年学术积淀基础上对晋商研究取得新进展。他认为17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金融界实行的镖局、标期、标利制度，是山西商人在金融贸易的实践中，摸索和创造出来的一套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货币资金融通制度，科学地解决了当时商品交易中的货款清结和借贷本利清偿期限和利率确定等一系列商业技术问题，正是凭借该制度生发出的诚信使晋商获得了商机和发展。

山西乡村中存在着大量乡土色彩浓厚的民间歌谣、神话故事与传说以及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间祭祀和民间工艺等，凡此种种，均可划入文化的范畴。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这些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加以解析，乃是一项非常重要和迫切需要开展的科研工作。寒声先生的5语言与区域社会文明)方言语音对民间音乐的创造与融

合力6 提出方言语音是社会交流约定俗成的自然产物，它本身只是一种看似共同语却又长于区域性的交际工具。据此认为晋文化可分为河东文化区、雁门文化区、并州文化区、上党文化区四大区系，其中有的还可细分为若干小区。这一区域划分方法对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极为有益。冯俊杰、王志峰 5纱阁戏人：平遥民间工艺的珍贵遗存6 从戏曲民俗的角度，通过大量图片和对纱阁戏曲剧目的解说，再现了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山西中部地方戏曲的独特风貌和繁荣情景，是进一步了解清代晋中地区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

迎神赛社活动是体现区域社会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权力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参照。山西受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完整的民众迎神赛社习俗，对其加以研究是深入了解山西社会特征的重要途径。李天生 5山西赛社文化浅说6 就山西赛社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价值作了分析，认为山西赛社文化中的民俗礼规不但保留有源于唐宋宫庭宴乐的礼制，而且显示了宋金元时期伎乐文化的特征，对于历史学、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均具重要价值，亟待保护、开发、研究和利用。洋教传入对山西近代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赵英霞 5明末清初山西天主教之际遇6 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山西各地的传教活动和山西官绅对天主教的接纳与利用，说明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内地传播中所面临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尤其说明了明末清初 100 年间天主教士是如何以带有中国本土化的传教方式度过在山西活动低谷期的。王守恩、刘安荣 519 世纪后期的山西传统文人与基督教6 则通过对封建时代传统文人对基督教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反应，说明基督教在山西传布过程中既受到部分传统文人的抑制，又得到部分传统文人的推动的状况。同时该文也对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认为的 1620 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全部转向仇视基督教的观点作了修正。

山西是革命老区，站在区域的角度，对根据地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进行全方位的透视，也是从总体上构建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从社会史的角度开展根据地史的研究，不但可以改变过去根据地史研究过于 / 干扁0 的状况，赋予其以鲜活的历史内容，生动地揭示处于动荡变革状态中的区域社会之发展变迁，而且会以其 / 鲜明的地域特征0 在根据地史研究中取得突破和进展，进而在时空上延续和再现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的发展变迁历程。由于根据地事实上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变革及其多方面的调整相当剧烈，因而可资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如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民主制度、民众动员、民众心态、乡村教育、妇女问题、婚姻风俗等。岳谦厚 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民经济) 保德县段家沟村之调查分析6 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 5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6 (手抄本) 为主要依据，通过分析晋西北地瘠民贫社会状况下人口、土地与生产力的非对称关系，细致考察了晋西北富于区域特点的社会经济类型和多重经济关系，提出黄土、革命和日本入侵三元素是贯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历程的主线，进而指出国内外研究华北农民经济的众多经典著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试图与马若孟、黄宗智、杜赞奇等人的研究进行比较并补充其研究的不足。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问题很有特点，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尤为必要。郭卫民 5对山西抗日根据地妇女社会地位问题的再思考6 提出根据地妇女社会地位并未因抗战而发生根本改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虽然在妇女动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使当地妇女走出家门，获得了一些有利于自身解放的变化，但只是妇女社会地位性质发生改变过程中的一次不稳定的量变，妇女地位的彻底改变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区村制问题是山西社会独特的基层政权管理体制，颇具特色。董江爱 5军阀统治下的乡村治理模式) 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山西区村制研究6 对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区村制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制度使自清以前国家权力仅限于县级的状况发生变化，通过在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实行区) 村) 闾三级管理体制，加强了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就根据地社会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研究内容相当丰富，研究成果相对不足，需要花大力气填补该方面研究的不

足。

此外，本次会议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开展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史维阁5长子剃头匠调查与研究6 充分利用田野访谈方法对长子剃头匠这一职业群体自清以来的发展变迁作了梳理，该研究贡献在于其方法论意义。李百玉 5民间契约价值略议6 以其多年来收集到的民间契约为例，呼吁加强对契约文化的研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山西民间契约研究学会。李百玉目前已收集有九大类契约上千张，是山西地方文献资料发掘方面的一个突破。李豫 5从 /共和白话报0 看民国元年的山西社会变异6 以其收藏的民国元年 5共和白话报6 为主要依据，对民元变革时期山西社会的变动状况做了考察，对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也使该文为之增色。张梅秀 5山西历代家谱的编纂与收藏6 对已搜集到的山西谱牒目录，从编纂年代、姓氏和地域分布、收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线索。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主要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一、实证性研究较多，史料范围广泛，尤其重视对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实证性研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提交会议的所有文章几乎全是以区域或个案的方式开展研究的。从史料范围来看，种类也相当繁多，地方志、家谱、碑刻、民间艺术、秧歌剧本、档案资料、社会调查、报纸、契约、笔记、日记等均包含在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珍贵报纸、档案文献和民间契约的发现，充实了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在资料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二、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既有传统的考证方法，更有计量方法、比较方法、田野调查方法以及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已经得到高校和地方学者的广泛运用，学者们对于田野调查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大力推行表示热切赞同。三、多数文章选题新颖，富有创新意义。比如对水井制度的研究和民间契约的研究等。相当一部分研究还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进展和突破，比如对晋商兴衰过程的阶段性划分和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等，反映了山西社会科学界近些年来的不懈努力。

对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如在碑刻资料的运用与价值问题上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持否定意见者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依靠碑刻资料作佐证，必须深刻挖掘碑刻资料背后的社会现实；还有学者提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可忽视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不可将研究局限于一省一区，要有开阔的视野，充分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需要警惕的是，理论探讨不足是本次会议显露出的一个基本问题，相关理论文章仅有三篇，说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在理论借鉴和创构方面仍需着力。总之，通过本次会议，全省各地学者充分认识到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前景，明确了各自的使命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期待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能够以此为契机，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